

##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由于二者是发生在大体相同的国际背景之下和大体相同的时间里，更由于二者在某些口号和形式上有类似之处，因此人们往往愿意将二者进行比较。

一、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日、中两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运动

日本学者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相当于日本幕府末期的186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一样，在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威胁中走着艰难的道路，但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环境各异，因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日本推翻了幕藩制度，于1868年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国家，而中国却是在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只想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洋务运动，……但是这样的洋务运动在依然如故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中国·科学·文明》第143页）薮内清先生把两国所处环境各异看成是两国在此后走的道路不同的原因是十分有见地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而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日本在1603年建立了德川幕府制度，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战乱状态，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

在农村，出现了商人阶层，他们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助于城市中的大批发商的贷款，把农产品收购起来转卖给上一层的商人或城市中的大批发商，从中获得商业利润。在棉织业中也出现了“换棉”和“租机”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作业分工的集中的工场手工业，1867年私营的雇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已有400多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社会中已出现了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势力。在幕府末年，大商业和高利贷也有较大发展，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叫做“株仲間”的商业垄断组织。有些商人已凭借手中的经济势力参与政治。据记载仅日本大阪市富商和高利贷借给封建主大名的债款就高达六千万两黄金，每年利息就相当于大米三百万担。有此富商和高利贷者已不仅能凭借经济势力挟制大名，而且还直接参与藩政。当时已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经济上有了这种势力，但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被视为下等阶级。另外，日本社会还有一个中国社会所没有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封建统治者固定的亲兵，不事生产，只能依靠禄米生活

幕府统治末期，由于财政困难，幕府和各藩经常削减和停发下级武士的禄米，使一大批下级武士和家属生活异常困苦。这迫使不少武士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法规的束缚，抛弃武士身份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为教师和医生等。有的甚至直接把武士身份转让给大商人，自己做商人家中的养子，直接同高利贷和商人资产阶级结合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化了的武士的出现和他们改革社会的政治要求使弱小的资产阶级有了同盟者，而且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中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方面又高于资产阶级，有些就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力量。

当时中国的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初期就出现了，到了明代中叶，雇主雇工的雇佣关系已较多见，在纺织业中比较明显，“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但经过明清之际的战乱，特别是清初封建统治者对江南比较发达地区的屠城和掠夺，原有的本来就很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只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才又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重新破土而出，缓慢发展。在江南和广东地区，包买商的出现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的证明。但是，由于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实行着一条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加之他们闭关锁国和垄断大商业及对外贸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就极为缓慢，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又加之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使中国社会直到洋务运动以前，也没有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生长出象日本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样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阶层来

其次，当时日中两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精神上的准备也是大不一样的。

日本民族向来就是一个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民族，他们没有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在没有与西方文明接触以前，他们一直把中国做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和消费品传到日本。后来基督教也传入了日本。对此，虽然德川幕府认为基督教的传入是幕府统治的一大祸患，但日本是幕府统治下的大名割据体制，大名有着比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吏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这种条件下，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带头信奉基督教，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式武器和科学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势力。于是，西方文明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当时在日本先后兴起的“兰学”和“洋学”就是日本民族这种热切学习西方文明的最好证明。如果说“兰学”还仅仅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向往，那么“洋学”则已经反映了日本人民对西方社会制度的向往。在1860年前后，日本人民通过向西方学习已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中国在向外国学习上与日本也是不同的。本来中国也有着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的，这在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佛教的东来和在中国与儒教、道教和平

共处互相补充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可悲的是，中国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却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身上的历史包袱，历史越接近近代，中国在世界上就越落后，而越其落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愈其抱定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虚骄心理不放。这在心理上与先把中国看成学习榜样后来又把西方看成学习榜样的日本是大不一样的。

西方近代科学和基督教早在明朝就传入了中国，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中国支持者徐光启、李之藻曾为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较日本更为有效的锁国政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早年曾因太子葬日事件下令严禁基督教，但他对西方科学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本身又比较开明，因此后来又逐步放宽了对基督教的禁令，自己还把法国传教士张诚（盖尔比隆）、白晋（布维特）招入皇宫，留在身边教授自己欧洲科学，他还特地在宫中设立学塾，给皇子 and 家臣讲学。但这些毕竟是皇帝的个人行为，没有象日本那样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到了康熙末年，发生了典礼问题，罗马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拜见康熙皇帝，要求那些已成为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不要进行祭祀祖先的活动，这一行为激怒了康熙皇帝，他下令严厉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后来，由于有的传教士参与了策划拥立雍正皇帝以外的皇子为帝的阴谋活动，雍正皇帝即位后马上惩罚了这些参与者并且再一次严禁耶稣会士到中国内地传教。

清王朝本来是以民族征服战争的胜利者来统治中国的，入主中原以后，对外他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皮鞭加糖饴的统治策略，对待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怀柔政策。满族统治者很快就被汉文化所同化，并且对汉文化产生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这样一种心理已在满族统治者心目中不容动摇地扎下了根基。这样在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中国却在满清五朝统治者的带领之下，动员大量知识分子和动员大量物力进行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一万卷之巨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纂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眼睛向后，自我欣赏自己伟大古代文化的心理的写照。中国古代文化的确伟大，它征服了自己的征服者，而且使他们五体投地，但是世界是在向前发展的，当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寻宝”和自我欣赏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并且看出了自己的不足，产生了对未来社会的向往，而中国人却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李鸿章传》第112页）这就在对自己和对西方的认识上大大的落后于日本了。

以上两条足以说明，在1860年前后，日本的社会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到了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可能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当时还没有产生可以使这样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可能产生的主观条件，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因此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在中国的洋务运动才

只能是一场封建阶级的自救运动。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的成败得失和功过是非，是无法机械地做横向比较的。

另外，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且胜利。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的资产者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又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日本的幕府统治虽然也是中央集权，但它是对地方割据势力的集权，而不象中国的皇帝是对地方行政长官的集权。日本的藩主大名是世袭的，对幕府有着很大的独立性，这与中国的地方长官可以由皇帝随意撤换和调动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日本的资产阶级新生力量才可能在西南几个受资本主义影响比较大的藩中集聚起革命的力量，并借以推翻幕府的统治，夺取政权。这种情况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二、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目的、道路、内容和做法都完全不同的运动

如前所述，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推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反对幕府的统治，希望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群众也以要求社会改革为口号，投入了反对幕府的斗争，这就是说，日本的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的要求，无论从明治维新运动的上层领导者看，还是从投入运动的广大基层群众看，他们掀起那场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

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推动这次运动的是手握清朝皇帝赐予的各种实权的朝廷重臣。他们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认为这种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他们之所以要推动一场洋务运动，是因为这“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坚船利炮”和“潜师洋法”的不肖之徒（农民起义军）的内外威胁，而中国“独火器万不能及”（《李鸿章传》第112页）西人，所以他们才上下奔走，推动洋务运动，“取西洋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人之长技”。（《李鸿章传》第113页）对外以御辱，对内以镇压那些“潜师洋法”的农民起义军。可见，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原有的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

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是一条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

1858—1868年之间，日本社会出现了和中国社会当时差不多的情况，内忧外患接踵而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要把日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阶层反对幕府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改革派以力量比较强的长州藩、萨摩藩和土佐藩为首，

联合了部分王室公卿，商人和部分封建领主，利用人民反抗幕府的力量，与德川幕府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斗争，终于在1868年前后建立和巩固了立宪君主制的明治天皇政府。明治政府成立后，就开始了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的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使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富国强兵之路。

中国的洋务派官僚，由于其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制度，巩固满清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压根儿就没想，也不可能去想要夺取政权，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王朝维护的正是洋务派官僚认为的那“远出西人之上”的制度，虽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当时还没认识到“取西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人之长技”的重要性，但只要这些洋务派大员反复上书言明，皇帝迟早是会恩准的。事实上洋务派官吏，李鸿章、曾国藩也好，奕、文祥也好，都无不是通过反复上书皇帝而取得最高统治者的恩准才推行他们的洋务运动的。虽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搞的，但这里的上与上已经不同，一个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治政府，一个是顽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而推动变革的原因，一个是要改造原有社会，一个则是要维护原有社会。

就改革的内容而言，明治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也明显不同，尽管人们可以因为他们都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而认为其相似，但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运动，它涉及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洋务运动却仅仅是一场引进先进技术的运动。

在日本，1868年3月，天皇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宣布了《五条誓文》，表达了地主资产阶级实现日本社会现代化的意向。1868年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确定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设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秩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剥削者转变成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日本实行内阁制，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明治政府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实行了新的有利于明治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学教育领域，明治政府派出100人以上规模的大型考察团，历时两年认真考察了欧美各国，从而确定了教育兴国的方针，把教育改革做为各项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准，培养科技指导人才，迅速掌握欧美先进科学技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六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以科学技术与实业相结合为总目标，大力兴办中等和高等综合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尽管明治维新运动的内容还涉及其他方面，但仅就上述，我们就可以借以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做一比较。中国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创办军事工业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训练新式海军和陆军，创办新式学校和派人出国留学。由于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在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单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运动，因此它不能称为一次革命和维新运动。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